

马相伯：毁家兴学创立复旦

1852年，镇江到上海的一叶扁舟上，载着一个孤独的12岁少年，名为马相伯，年仅12岁。马相伯出生时，适逢鸦片战争，他的一生，是在反抗外国侵略、谋求祖国富强、唤起民众奋起救国之中度过的。

这一年，马相伯瞒过父母，独身前往上海，投入一所教会学校，到18岁时，法文和拉丁文都已精通。法国驻上海领事馆得知，请他去领事馆当翻译。这是被许多人羡慕的美差，可是马相伯说：“我学法语，是为中国人用的。”

20年的寒窗苦读，马相伯精通拉丁、希腊、英、法、意、日、印度七国文字，学富五车。在接受神学博士学位和神父职位时，马相伯表示：科学知识，是世界人类所共有，不应分为中外，学习西方的学术，“尽彼所长，转授国人”，使我国“与世界同尽其能”，所以“西人学社名位可受”。

后来，他担任徐汇公学校长，讲授经史子集。1876年，中国遭受了巨大的饥荒，史称“丁戊奇荒”，马相伯自筹白银2000两救济灾民。

毁家兴学首创震旦

1900年，60岁的马相伯将名下的三千亩地等家产悉数捐给教会，希望教会能办一所中西大学堂。教会虽然接受了马相伯的财产，但并不办学。真正迈出办学第一步的还是马相伯自己。

1902年，蔡元培执教的南洋公学学生反对当局的封建压迫，200余人集体离校退学。退学学生请求蔡元培协助组织“共和学校”。蔡元培介绍了一些学生到马相伯处求学，马相伯欣然允诺，遂创立学院，定名“震旦”，意谓中国之曙光。

1903年，在震旦学院的开学典礼上，马相伯发表演说，反对科举制度，反对我国自秦汉以来的“奴隶”之学、“为人”之学，提倡“格物穷理”之学，“自主”之学。他虽是天主教徒，借用教会力量办学，却宣布办学三条宗旨：一、崇尚科学；二、注

重文艺；三、不讲教理。他以60余岁高龄，亲自教授拉丁文、数学、哲学，编写《拉丁文通》《致知浅说》为教材。他还规定学校内部事务，由学生自行管理，财政公开，藉以养成共和精神。

艰难复校创办复旦

1905年，法国天主教会不满马相伯办学精神和“一切宗教教义的宣传退出学校的领域”等主张，取消马相伯的主管权，让马相伯无病而入院休养，并改组震旦，使学校性质严重改变。此举引起学生极大愤慨，决议全体退学。于右任、邵力子等去找马相伯，说：“我们已经散学了，但是我们还要读书。”当时，马相伯眼泪就掉了下来，一方面为震旦的解散而伤心，一方面为学生的前途命运而担忧。

马相伯召集离散学生，并与严复、于右任、熊希龄等人筹备复校。在筹备复校期间，天主教会盗用震旦学院名称登广告，招收学生。为正视视听，马相伯与严复、熊希龄、袁希涛商议，决定联合发表声明，澄清事实真相。马相伯还向社会宣布，复校后的校名更改为“复旦公学”。“复旦”二字，取自《尚书大传》所载《卿云歌》中的“日月光华，旦复旦兮”，寓含“复我震旦”和“复兴中华”之义。

复旦初创，举步维艰，为节省开支，年迈的马相伯亲自讲授法文班各课程，终日口指指

画，不以为苦，其诲人不倦、献身教育之精神，无不令学子们感动。在马相伯率领下，全校师生筚路蓝缕，自力更生，终于闯出了一条由中国人独立自主创办新型大学之路。

提携后学师生情笃

清末民初的各界名流中，曾师从马相伯的数不胜数，可谓桃李满天下，如梁启超、蔡元培、张菊生、汪康年、马君武、邵力子、刘成禺、于右任等。

马相伯对学生非常爱护，他重建了孔子有教无类的传统，只要有才能的、愿意学的人，马相伯一律收入门下。其中，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，就是于右任。于右任因作诗讽刺慈禧太后卖国，遭到通缉、逃亡上海，马相伯毫无畏惧地收于门下，还免其学杂费，为安全起见，马相伯让于右任化名“刘学裕”，并对他说：“不以空言抒愤，救国必先科学。”这影响了于右任的一生。

1936年11月23日，国民党政府悍然下令，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、章乃器、邹韬奋、李公朴、沙千里、史良、王造时等“七君子”。马相伯立即写信给冯玉祥，表示愿以“首领”担保。12月12日，马相伯在于右任陪同下到达南京，竭力设法营救“七君子”。1937年7月31日，“七君子”终于在苏州出狱。9月6日，“七君子”和杜重远专程前往马相伯在南京的下榻处，看望这位爱国老人，并在小楼门前合影留念。照片拍好后，由沈钧儒代表“七君子”在照片左下侧题写“唯公马首是瞻”6字。

国家之光人类之瑞

1931年，日本占领中国东北，马相伯心中忧愤，奔走呼号，发表演说，激励国人御侮自救，共赴国难，时人赞其为“呼号抗日老青年”，这时，马相伯已经90余岁高龄了。马相伯既是著名教育家、翻译家，更是享誉海内外的书法家，他平日里惜墨如金，从不轻易为人写字，在抗日救国的驱使下，他写字义卖，筹集抗日军费。义卖，一个“寿”字30元，一副对联50元，当时马相伯一只脚坏了，就让两个人扶着



救国会七君子出狱后与杜重远一起和马相伯合影

他，站着不停地写，别人劝都劝不动，他写到自己实在是写不动了，才稍微休息一下，最后义卖筹得10万元。

1937年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在鸦片战争中出生的马相伯，尝遍了近代史上所有外辱，上海沦陷后，他亲手创办的复旦大学迁往大后方，马相伯也走上了流亡的路。马相伯先是流亡桂林，后因战局吃紧，他再从桂林流转昆明，当走到越南凉山时，他羸弱的身子再也走不动了，就只好留在越南凉山。他的家人，都不敢告诉他这是外国，因为他是坚决不肯留外国的。也正是在这个时期，马相伯为复旦学生写下了“读书不忘救国，救国不忘读书”。这是他讲了三十几年的一句名言。

在流亡路上，马相伯度过百年寿诞，复旦的师生们为他祝寿。老师写了这样的一封信，信上写道：“国无宁土，民不聊生，老朽何为，留离异域，正愧

无德无功，每嫌多寿多辱。”他叮嘱有关人员把各地各界为他祝寿的寿仪聚集起来，全部转送给抗战伤兵和难民，一文不留！中共中央电贺，尊他为“国家之光、人类之瑞”。

此后，马相伯的身体每况愈下。临终前，也许是有预感，他找来最疼爱的孙女马玉章，问她：“爷爷没有给你留下一分钱，连你自己的钱也没有留给你，你恨爷爷不恨？”“你自己的钱”指1914年马玉章父亲马君远病逝，当时马玉章只有6个月大，马相伯的得意弟子于右任、邵力子他们筹措了1万元，以此作为资助马玉章日后的生活和教育费。马相伯将这笔钱拿去捐给启明女校，没有留给孙女，故有此一问。除了给孙女的交代，他还留下了这样一句话：“我是一只狗，只会叫，叫了一百年，还没有把中国叫醒。”赤诚之心，令人感慨。

(据《北方人》)